

深切缅怀敬爱的黄秉维先生

郑度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100101)

摘要: 黄秉维先生是中国现代地理学的开拓者, 他以其渊博的学识和辛勤的劳动, 为推动中国现代地理学的发展, 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勤奋刻苦、博览群书; 治学严谨、一丝不苟; 启发引导、提携后学; 他倡导学术争鸣和宽松的氛围, 坚持真理, 探索求是。他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主张地理学要面向建设实践, 服务国家和地球家园。我们要认真学习黄先生的学术思想和高尚风范, 沿着他指引的地理学前进方向, 为提升我国现代地理学的发展水平和建设地球家园的美好未来做出积极的贡献。

关键词: 黄秉维; 现代地理学; 治学严谨

我从中山大学毕业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 有幸在所长黄秉维先生亲自领导的自然地理研究室工作。在42年多期间与他有稍多的接触, 亲聆他的谆谆教诲。我的学习和工作一直得到他的亲切关怀和悉心指导。现追忆点滴事例以缅怀黄先生治学严谨、探索求是、服务家园的长者风范和崇高品德。

1 勤奋刻苦 博览群书

黄先生早年就养成勤奋的习惯, 加倍努力学习。大学四年, 他更是: “黄卷青灯, 夜阑不寐, 跋山涉水, 迅迈无前”。1950年代以来他工作更加繁忙, 时间非常紧促; 但他却一直视阅读看书为生命, 宁可放弃休息和睡眠, 也硬是要挤出时间来看书。陈述彭先生曾说过, 他常在凌晨4、5点钟和黄先生通电话进行交流, 因为陈先生有早睡早起的习惯, 而黄先生经常要彻夜看书或写作到清晨。在1990年代后期, 有一天上午他到所里来开会, 中午在所里食堂用餐时, 中国农科院有位专家说起百岁院士金善宝先生晚年有每天要睡眠12个小时的习惯, 黄先生当时在旁边跟我说, 我昨天到现在还没有睡觉呢, 可见他经常要看书到深夜甚至通宵不眠。

“文革”期间, 黄先生作为学术权威也无例外地受到批判和冲击。1970-1971年我们一起下放到湖北潜江“五·七”干校, 尽管白天要参加体力劳动, 他却不顾疲劳仍然习惯于晚上看书学习。那时, 大家住在五、六人一间、上下铺双层床的集体宿舍里。他怕影响大家休息, 特地将床头小台灯罩上, 看书一直到深夜。后来, 潜江“五·七”干校的图书馆需要一名管理员, 考虑到黄先生年纪大, 不宜从事强体力劳动, 便安排他到干校图书馆当管理员。他利用这一机会, 广泛浏览群书, 而且每天还借几本带回宿舍, 晚上认真钻研学习。当然, 那时没有多少科技书刊, 主要是政治书籍。黄先生恰好利用这一时机, 学习了马列主义的许多经典著作, 使他增强了政治识别能力。所以, 在随后的“批林批孔”和“批邓”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浪潮中, 他能坚持真理、实事求是, 不随波逐流。在粉碎“四人帮”之后, 他认为“十年动乱”结束, “科学工作由漫漫长夜转入黎明”, 他要把64岁当成46岁, “再在已开辟的园地, 继续耕耘”。

收稿日期: 2012-11-05; 修订日期: 2012-12-08

作者简介: 郑度, 中国科学院院士。E-mail: zhengd@igsnr.ac.cn

2 一丝不苟 治学严谨

黄先生做学问非常认真,对已发表的文章他常指出其中的不足,不断修改纠正自己原有的认识。1959年由他主编完成的《中国综合自然区划(初稿)》,揭示了我国自然地域分异的地带性规律,在理论和方法上有很大的突破和创新。但他仍然分析并指出该方案的不足和问题,并不断修正改进。如早在1965年“论中国综合自然区划”一文中,他就将《中国综合自然区划(初稿)》中的“热量带”改称为“温度带”。他指出“据现有知识,温度对植物生长与分布的影响,比热量的影响大得多。光当然也很重要,但按温度划分一般已足以表达光强与日长对植物作用在大体上的地域差异”。因此认为“可以用温度来近似地包括光和热两个因素,按此划分出来的带应该称为温度带”。1980年代他又指出该方案的区划系统过于繁杂,并提出了新的修订方案:《中国综合自然区划纲要(1986年)》。

黄秉维先生主持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工作三十多年,为我国地理科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介绍黄先生的学术思想,编辑出版他的文集是地理学发展的需要和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1989年夏,地理研究所成立了以所长左大康为组长的《黄秉维文集》编辑小组,开始汇辑黄先生的论著目录、收集手稿文献,多方征求意见,确定入选文稿。黄先生本人对文集的编辑不积极,一再说过去的文章有不足和缺陷,多次推辞,不与合作。当时我作为编辑小组的常务成员,曾对黄先生说:这不是您个人的事,您的论著是我国地理学界的财富。即使过去您发表的文章存在个别问题甚至有些错误认识,把它们汇辑在一起,大家更能看到您学术思想的进步和发展的脉络。后来,我还举出谭其骧先生在《长水集》自序中的一段话,即谭先生自己最初不答应出文集后来又同意出的理由来“说服”他。几经努力“劝说”,在得到他的默许后,我们便将初选的63篇论著目录送黄先生审定。他删去了一些不是他主要研究领域的文章,又补充了若干重要的论文,共计选编论著47篇,其中未公开发表的有14篇。他原拟逐篇过目,加以评注。我们担心因此而延误出版,希望他写成一篇总的评述。在他赴三峡考察前夕,文集即将付梓之际,他撰写了“自序”和3万余字的“自述”。正如他在“自序”中所说,“原拟用《自然地理综合工作60年:教训与体会》为书名,编者坚持要将‘教训与体会’删去,而我本人仍希望读者不要忽略这‘反面教员’的作用”。黄先生就是这样,对发表文章极其严谨,做学问一丝不苟、十分认真。

3 启发引导 提携后学

1950年代末,黄先生按照研究地表现代自然过程三个方向拟订课题、培养人才、准备条件、组织落实。在当时他兼任主任的自然地理研究室建立了相应的三个学科组,即:物理地理组(或热水平衡组)、化学地理组和生物地理组,围绕统一的计划任务开展研究。按照黄先生的安排,我在生物地理组落户。

黄先生对我们年轻人着重要求补充所欠缺的专业知识,从一两个自然地理要素的互相联系入手,逐渐拓展综合研究的能力。他认为西北干旱区植物种类相对简单,植物与环境要素间的关系也比较容易辨识分析。所以1959年成立中国科学院治沙队,就让我参加对北疆准噶尔盆地沙漠的综合考察,在实际工作中向植物所的胡式之先生学习并掌握有关植物生态学与地植物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也向队友们了解风沙地貌和土壤的学问。年底总结时我写成一篇文稿,探讨准噶尔沙漠植被与环境的关系。尽管该文章只是我学习的点滴体会,认识比较肤浅,写作也不够规范,却被推荐到1960年初全国地理学术会议的小组会上交流,得到刘慎谔先生的肯定,这对我是一极大的激励。

1960年春又安排我跟王荷生组长到南开大学生物系,在崔激先生的实验室进修学习

有关植物水分生态生理方面的实验方法和技术。随后结合西北地区水分平衡的科研任务,我在甘肃民勤治沙综合试验站连续三年开展包括沙生植物、林带乔木和春小麦在内的植物蒸腾的观测试验研究工作,黄先生还要求我编写有关植物蒸腾观测试验的规范。通过面上的综合考察对植被与自然环境各要素的相互关系有了初步的理解,在试验站的观测试验中又加深了对地表自然过程周日、季节和年际变化的认识。这些都为我后来自然地理的综合研究工作打下较扎实的基础。

1966-1967年我参加了对珠穆朗玛峰地区的综合科学考察工作。在室内总结工作的1968年,黄先生亲自为我们翻译被誉为山地之父的德国地理学家特罗尔(Troll C.)《热带山地及其气候与植物地理三维分带》一书(德文版)的部分章节。后来他还审阅了我们关于珠穆朗玛峰地区自然分带的论文,提出修改文稿的许多有益建议。

1972年地理研究所恢复科研工作时,黄先生就自然地理学理论研究问题撰文(见《地理学综合研究》156~164页)指出,要在一定范围内根据事实资料进行理论总结,“与西藏高原综合考察结合和配合,研究高海拔地域的地带性和非地带性规律问题”。在1979年黄先生为我到国外进修学习所写的一封信中,提出我应当更好学习有关科学试验的新发现,了解学科新进展,掌握与熟悉新方法,在深入的基础上拓宽研究的视野。可见他十分关心我们年轻人的成长,并对我们提出新的要求和期望。

黄先生作为中国科学院西藏科学考察队学术委员会的委员,非常关心青藏高原自然区划的研究工作。1980年代后期,他亲自对我们说,要注意青藏高原自身的特点,不宜搬用在低海拔地区所采用的规则。他特别强调地形的作用,并要我们探讨解决高原和山地区划中代表基面及其海拔高程等问题。在他这一学术思想指引和启发下,我们不断加深对山地与高原综合自然区划问题的探讨,初步认识了青藏高原地域分异的三维地带性规律,并参照黄先生关于综合自然区划的体系,提出了青藏高原自然地域系统的方案。

4 宽松氛围 学术争鸣

1998年黄先生谈到在1930年代和李四光先生一起在庐山考察冰川地貌时,彼此意见并不一致。他说:“当时我很佩服李先生,一面和你谈,一面在做他的化石工作。那时我们才大学刚毕业,他已经是一个很著名的学者,我们在那里反对他,怀疑他,他还是非常的客气,所以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在黄先生的学术生涯中,他一直倡导学术自由,提倡百家争鸣和宽松的学术氛围。例如,关于我国热带北界问题从1950年代起就存在不同意见和争议,黄先生主张需要很好地讨论,“不论能否取得一致,都应各述己见,求同存异,作一个阶段性的总结”。1990年代初黄先生收到《地理科学》编辑部寄来任美镠与曾昭璇先生“论中国热带的范围”的文稿,虽然和他的观点不同,但他很快就建议刊出。随后他曾将所撰文章:“关于热带界线问题: I. 国际上的热带、亚热带定义”的初稿,分别寄送给《地理科学》编辑部和任美镠先生,表明黄先生身体力行营造宽松的学术氛围。

黄先生对人和蔼、平易近人,我们在科研工作中遇到问题有机会就向他请教,他也很乐于谈出自己的看法,启发我们如何深入进行探索。他鼓励我们年青人发表各种观点和意见,即使看法有错,他也耐心地加以启发和引导。同时他注意认真听取年青人的一些好的见解,如1981年林振耀和吴祥定从气候角度将青藏高原划分出高原寒带、高原亚寒带和高原温带,黄先生审阅他们的论文并加以肯定,随后他在“中国综合自然区划纲要”中也予以采用。后来我和黄先生讨论青藏高原的自然区划时,根据1987-1988年我对该区实地考察的认识,建议可将高原寒带略去而并入高原亚寒带,他对此表示同意和认可。

1990年代后期黄先生提出要开展新一轮的中国自然区划工作,张新时先生建议可以申请跨学部的重点基金项目。在1997年一次关于自然区划的座谈中,张先生主张用生物

群区 (biome) 一词, 黄先生则提出用生物物理 (bio-physical) 一词, 指生物与自然环境相结合的区划。我考虑前者偏于生物本身, 后者易与微观的生物物理混淆, 遂建议用生态地理区域系统, 包括生物与非生物两大类要素。黄先生鼓励我们组织申请基金项目, 也同意这一提法。在他的支持和指导下, 我们承担并开展了“中国生态地理区域系统及其在全球环境变化研究中的应用”重点基金项目的研究工作。

5 坚持真理 探索求是

黄先生一直主张要综合地研究问题, 又强调对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1980年代初, 他在《地理知识》上发表了“确切地估计森林的作用”(1981)和“再谈森林的作用”(1982)等重要文章。他指出:“森林有防止土壤侵蚀, 调节河水流量, 提供木材和其他林产品的作用, 强调保护森林和植树造林, 的确是当务之急, 我完全赞成, 却不赞成过分夸大森林的作用”。他说,“现在有一些议论, 几乎认为‘森林万能’, 只要有了森林, 便万事大吉。这是缺乏科学依据的”。他旁征博引从科学的角度阐述了在不同自然条件下森林可能产生的不同作用, 强调要实事求是地研究和认识森林对自然环境的作用。黄先生的观点持之有理、论证有力, 他的秉笔直书的确打破了内行人的沉默, 让大众听到和了解科学家的正确意见, 在我国学术界产生很大的反响, 也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当年在《地理知识》发表“确切地认识森林的作用”的一位作者在1990年参观地理研究所成立50周年展览后, 曾对陪同参观的黄先生的一位学生说, 我们当时是被安排写文章与黄先生商榷的。

在2000年春的一次研讨会期间, 水利部原部长杨振怀先生告诉我, 他在春节前将黄先生关于确切估计森林作用的两篇文章复印给国务院领导同志, 希望他们在假日期间能有时间读一读。后来国务院领导同志批转给有关主管部门, 有关部门组织专家座谈并写了一个报告说, 不知为什么又把黄先生的文章拿出来, 还称黄先生在私下里曾承认他的观点有偏颇。黄先生得知后非常生气, 说我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里从来都没有这样说过。事后, 黄先生专门组织召开关于森林作用的学术研讨会, 安排老中青科研人员相结合的课题组, 对近20年来这一领域的成果加以研究和综述。研究结果仍然证实了黄先生的观点, 即森林对于水的作用决不是一个模式, 要按实际情况确切估计森林的作用, 并不是说到处有了森林, 水就会变多或变少, 或是某个季节变多, 某个季节变少, 没有一定的规律。黄先生在“确切地估计森林的作用”中指出“我们必须按照现在的条件, 对森林的作用逐项加以分析, 然后综合起来, 用以指导我们的工作部署, 不问是否符合事实, 是否真有道理, 夸大森林作用, 在行动上就可能盲目大干, 劳民伤财, 给国家经济带来不应有的损失。”他的观点至今对我国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方针的制订和实施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6 结合实践 服务家园

20世纪40年代初期黄先生在资源委员会工作期间曾主持撰写了许多研究报告, 如“中国动力资源之区域分布”、“东北资源概况”等, 说明他一直关心国家的建设工作。在1950-1980年代担任地理研究所所长期间, 他既重视地理学基础理论与方法的研究, 筹划全国地理科研机构的布局与科研工作的部署, 同时他认真贯彻任务带学科的方针, 将发展地理学与服务国家目标和满足社会实践需求结合起来。1953年他就参加黄河中游土壤侵蚀与保持的考察与调查, 亲自编制了我国第一幅1/400万黄河中游土壤侵蚀分区图。1959年他担任中国科学院治沙队副队长, 安排地理所的大批科研人员参加, 并于1960年亲赴西北省区几个治沙试验站指导工作。在1960年代初, 他又根据国家需求, 部署开展中国北方水分平衡研究任务, 开展定位观测试验工作, 保存了有生力量。

1980年代后期,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科研体制改革引入竞争机制。黄先生一方面继续重视基础研究,另一方面十分关注国家建设和区域发展研究。以坡地改良与利用领域为例,黄先生综合坡面水蚀、土壤保持和木本油粮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考虑传统农业与非传统农业的经验教训,明确指出中国东部存在着采用生物措施显著提高坡地持续生产力的可能性,而充分改良和利用坡地是解决我国农业问题的关键之一。黄先生于1988年赴粤,组织专家修订计划,以广东科学院属下的几个定位站为依托开展试验研究,此后他还曾几次前往指导。经过多年努力,获得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总结出有效的改良利用经验与模式,对绿化荒山、保持水土、山区发展起到很好的作用。

1991年地理研究所和成都生物所共同承担国际山地研究中心(ICIMOD)的项目,我和申元村、唐亚等同事前往四川宁南县,按照黄先生关于坡地改良利用的指导思想,推广等高植物篱种植等技术,取得一定成效。

1992年黄先生到兰州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会建议并申报“中国东部典型区坡地过程及其改良利用研究”的重点基金项目,组织有关单位联合在三峡库区秭归开展试验研究,从等高植物种类的选择、当地群众坡地利用经验的总结到与石坎梯田的投入产出比,他都做了部署和仔细的了解,希望能为中国东部坡地资源的充分利用做出应有的贡献。

作为中国现代地理学的开拓者,黄秉维先生献身地理科学工作70年,领导20世纪后半叶我国的地理学事业。他以其渊博的学识和辛勤的劳动,为推动中国现代地理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治学严谨、实事求是、锲而不舍,不囿于成说而锐意创新。他坚持地理学综合性和区域性的特点,不断开拓指导地理学的综合工作,维持了地理学学科的稳定发展;他积极引入新技术新方法的思想促进了地理学研究的深化,导致实验地理学的建立;他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主张地理学要面向建设实践,他长期贯彻为农业服务的思想为地理学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空间;他提出开展陆地地球系统科学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方向,对中国现代地理学的发展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总之,黄秉维先生在治学、工作与为人方面的长者风范和全心全意为人民、为祖国鞠躬尽瘁的崇高品德,不愧是我国地理学界的一代宗师。我们要认真学习黄先生的学术思想和高尚风范,沿着他指引的地理学前进方向,为提升我国现代地理学的发展水平和建设地球家园的美好未来做出积极的贡献。

In memory of Academician Huang Bingwei

ZHENG Du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As a brilliant geographer, Professor Huang Bingwei, with his erudition and hardworking spirit,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contemporary geography in China. He was renowned for his meticulous lectures, and through his didactic approach has guided and helped many young researchers. He encouraged free discussion that was conducive to an enriching academic atmosphere. He contributed many seminal papers to contemporary geography and through his research implemented many policies and strategies that are effective in China today. On the occasion of commemorating this prestigious master, we remember Professor Huang Bingwei's academic achievements in geography and also his sublime moral character. He has left a lasting legacy that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geography in China and builds a bright future for all of us.

Key words: Huang Bingwei; contemporary geography; meticulous scholarship